



# 白雨斋词话

诗有诗境，词有词境，诗词一理也。然有诗人所鲜之境，词人尚未见者，则以时代先后，远近不同之故。一则如渊明之诗，淡而弥永，朴而愈厚，极疏极冷，极平，中正之中，自有一片热烈，缠绵往复，此以独无词造此境者。一则如杜陵之诗，包括万有空阔倚倚，纵横博大，千变万化之中，却极沉郁顿挫，忠厚和平。此子美所以横绝古今，无与为敌也。求之于词，亦未见有造此境者。若子建之诗，飞卿词固已几

[清] 陈廷焯 著

彭玉平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詩有詩境，詞有詞境，詩同一理也。然有詩人所避之境，詞人尚未  
 見者，則以時代先后、近近不同之故。一則如清明之詞，淡而弥  
 永，朴而醇厚，極疏極冷，致至極正之中，自有一片飛騰，纏綿往  
 復，化此以独雨，无齋詞話。此境  
 者，一則如杜陵之詩，包括万有，空浩無倫，欲極博大，千變万化  
 之中，却極沉郁頓挫，忘厚和平。此子美所以橫絕古今，无与为敌  
 也。求之重詞，亦未見有達此境者。若子建之詩，飛卿詞固已几

[清] 陈延焯 著  
 彭玉平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雨斋词话/(清)陈廷焯著;彭玉平导读.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5325-5397-6

I. 白… II. ①陈…②彭… III. 词话—中国—清代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5517号

### 白雨斋词话

---

[清]陈廷焯 著 彭玉平 导读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mailto: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发行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制版印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6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80,000

印数 1-5300

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5397-6/I·2129

定价 18.00元

清词素称中兴，其中词学之发达，乃是其中之关键，从云间派、浙西派、常州派到临桂派，词派转换之间，词学思想的纷争也交叉其中。迄晚清之时，词学理论的门户之争渐趋消歇，而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相继而起，蔚然而成有清一代词学之璀璨结响。其中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不仅在三本词话中时序最早，而且其涉猎范围最广，篇幅最富，在以核心范畴为主，持以批评词史，总结理论方面，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都堪称是导夫先路之作。20世纪30年代，吴梅《词学通论》名动一时，其中许多观点即取资于《白雨斋词话》，因而其价值和意义值得充分估量。

### 一、陈廷焯其人及著述

陈廷焯（1853—1892），原名世焜，字耀先，一字亦峰，镇江丹徒（今江苏丹徒）人。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陈氏一生以读书、著述、授徒为务，曾随父亲陈铁峰流寓泰州、黄岩等地，其生平《丹徒县志 抚余》和《续志》有简略记载，《续纂泰州志》亦将其

列入“人物流寓类”。陈氏幼承庭训，早年致力诗词，中年潜心医理，笃志古文，而其志则在于经世济时，“尝言四十后当委弃辞章，力求经世性命之蕴”（王耕心《白雨斋词话·序》。本文以后所引用有关《白雨斋词话》文本及序跋文字，仅在引文后括注篇名或卷数）。

陈氏一生交游颇广。居丹徒时，曾过镇江，在焦山松寥阁有题壁。寓居泰州时，到过靖江、宜陵等地，集中并有纪游之作。己丑年（1889）为赴礼闈试去过北方，途径山东等地。迁居浙江黄岩时，道经南京、杭州等地。早年也曾南下广东等地。陈氏所到之处，广交学友，切磋学问，尽览当地名胜。

陈氏为人性情忧郁，年十四，读谢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诗句而“为之拍案惊绝，十余日不敢起视焉”（陈廷焯《骚坛精选录》卷七，未刊，手稿今藏陈氏后人处），后来随着家道中落，流寓异乡，屡困科第，以“怨”命题的诗词频见于《白雨斋诗抄》、《白雨斋词存》之中。王耕心《序》说他“父兄之劳，靡不肩任；宗族之困，莫不引为己忧”。家族是如此，个人志向的困顿更是如此，其《出东门》诗云：“但看古来豪杰士，功名坎壈空尔为。矧余弩钝力不足，忧愁郁结当告谁？”则其忧郁的性情其实是渗透到许多方面的。

陈廷焯治学精苦，对经史根究义理，贯穿本原；对诗文取法乎上，标格甚高，早年作诗更是不屑于杜甫以外之人物。陈氏一生著述较富，其弟子包荣翰说他“著作林立”，王耕心也言及陈氏去世后“遗书委积，多未彻编”，可惜大都散佚。据笔者考索，约有以下八种：

1.《词则》，词选，分大雅、放歌、闲情、别调四集，以“大雅”为正，三集副之。凡24卷，选词2360首，手稿今存陈氏后人处，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

2.《白雨斋词存》，词集，凡46首，有光绪甲午年（1894）刻本。

3.《白雨斋诗抄》，诗集，凡82首，有光绪甲午年（1894）刻本。

4.《云韶集》，词选，凡26卷，选词3434首，为早期选本，未刊，手稿今藏南京图书馆。

5.《词坛丛话》，词话，不分卷，凡106则，唐圭璋《词话丛编》有收录，手稿今藏南京图书馆，位列《云韶集》之前。

6.《骚坛精选录》，诗选，残本，现存合六朝、盛唐诗选，附评，未刊，手稿今藏陈氏后人处。

7.《希声集》，诗选，凡六卷，一称八卷，未见稿本、刻本，或已佚。《白雨斋词话》卷十云：“余选《希声集》六卷，所以存诗也；《大雅集》六卷，所以存词也。”《大雅集》乃其词选《词则》四集之一，则《希声集》是否为其一大型诗选之一部分，待考。

8.《白雨斋词话》，词话，详下。

另有《唐诗选》和《二十九家词选》两种拟作，虽纲目初具，但未必成书。

## 二、《白雨斋词话》的版本源流及形成原因

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自序》撰述于光绪十七年（1891）末，而其初稿则完成于1890年，并曾亲携

初稿请王耕心为序，此后可能经过一年多的修订而定稿。故王耕心在《白雨斋词话序》中虽然提到陈廷焯去世之时，遗书“多未彻编”，但“手录《词话》，已有定稿”，故十卷本词话的定稿工作可能一直持续到陈廷焯去世前不久。陈廷焯对于词话的付梓是谨慎的，其甥包荣翰《白雨斋词话跋》云：“亦峰舅氏……所著《词话》八卷……荣请付梓以公诸世，舅氏不许，谓：

‘于是编历数十寒暑，识与年进，稿凡五易，安知将来不更有进于此者乎？’则舅氏之浸润沉潜于此道，岂寻常诣力所能造也耶？”包荣翰此跋当作于八卷本编订之后，故有“《词话》八卷”云云，而其中所谓“数十寒暑”云云，则是就陈廷焯学词体悟之经历而言的，固非词话具体写作所历之时间。

就目前流传的情形来看，《白雨斋词话》的版本有两个系统：一为八卷本，凡696则，有光绪甲午（1894）刻本，附《白雨斋诗抄》、《白雨斋词存》，此后唐圭璋《词话丛编》收录之《白雨斋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杜维沫校点本《白雨斋词话》等，均出此甲午刻本；二为十卷本，凡738则，手稿今藏陈氏后人处，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末附唐圭璋《后记》），齐鲁书社有屈兴国校注之《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上、下册）。

为什么一种词话会出现两种版本？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十卷本为陈廷焯生前所定稿，故其自序有“萧斋岑寂，撰《词话》十卷”云云。但光绪甲午年（1894）初刻之时，已将手稿本删去42则，重新厘定为八卷。删除重订的工作可能是在陈廷焯父亲陈铁峰的

授意下，由陈廷焯门人许正诗、王宗炎、包荣翰等完成的。汪懋琨、王耕心之序、包荣翰之跋都提及此事，而许正诗《白雨斋词话跋》言之更为明晰：

先师陈亦峰先生……既歿二年，太夫子铁峰先生整其遗著，得若干帙。正诗与同门王雷夏诸君子因有剞劂之请，而铁峰先生谦抑至再，以为不足传，仅许刻其《词话》八卷，并请诗词附焉。

许正诗特别提到陈廷焯尊翁“仅许刻其《词话》八卷”。然则余出的两卷是陈铁峰删略，还是陈廷焯门生所为，言语之间仍不免模糊。唐圭璋在影印本《白雨斋词话·后记》中说：

初，陈氏歿时，尊翁铁峰老人尚健在，令陈氏门人许正诗、王宗炎、包荣翰等删十卷为八卷，于光绪二十年（1894）木刻行世。

唐圭璋的这一结论或许只是以情理推测的，但确实是可能性最大的。

那么，删略的原则是什么？诸家序跋均未明言。笔者粗加对勘，发现删削、修改之条目或为陈廷焯自评己词的内容，或为语涉纤艳而宗旨略背其沉郁顿挫之说者。前者之例如：

《蝶恋花》一调最为古雅。……余曾赋四章，非敢云抗美古人，要亦不外《离骚》“初服”之义。（卷六第27则）

……己卯九月，余作《买陂塘》一阕，呜咽缠绵，几不知是血是泪，盖天地商声也……（卷六第33则）



余曾作《菩萨蛮》云：“青山断续江如带……春归人不归。”起二语嫌着力，余皆悲郁而和厚，有风人遗意。（卷十第58则）

寂寞空城鼓角鸣，敌楼西望旅魂惊……此余丙戌年《杂感》中四律也。声调极悲壮，而不免过激，发之于诗尚可，发之于词则伉矣。（卷十第59则）

删削的条目中约有一半属于这一类，或许陈廷焯尊翁觉得不宜自评若此，有失著述体例，故请删略。另有一部分条目内容与此相类，但措语尚有分寸，故或斟酌其词，或合并数则为一则，以省篇幅。其例如十卷本卷六第40、41则自评自己所作艳词之法，八卷本仅取第40则开头一节，将“然如《菩萨蛮》十二章”以下文字悉数删除，并接以第41则的内容，即使所保留或衔接部分的文字，也略有润色。

或是出于维护陈廷焯已沉郁顿挫为理论核心的需要，十卷本卷三若干论及浙西朱彝尊、董以宁诸家艳词、妖词而位置大体相接续的18则词话也被一例删除。如：

竹垞艳词，确有所指，不同泛设，其中难言之处，不得不乱以他词，故为隐语，所以味厚……（卷三第58则）

竹垞《西江月》结句云……凄丽而幽索，总非凡艳。（卷三第60则）

……国初诸公多好为艳词，未有如竹垞之空前绝后者。虽非正声，亦令人叹赏不置。（卷三第61则）

董文友，词中之妖也，与王次回《疑雨集》

可谓匹敌。《满江红》十二章，置之《蓉渡集》中，无乃不类。（卷三第70则）

《花影词》不过如倚门卖笑者流，并不足为词之妖。《蓉渡词》乃真足惑人矣，此妖之神通也。（卷三第72则）

例多不烦举，但对浙西诸家艳词的这类评论的整体性删除，其目的或因陈廷焯出语略显随意，或这类词话的存在可能影响到陈廷焯理论的逻辑性、严密性，故为矜慎起见而删除。

至于那些词话内容虽然保留下来，但进行过少量文字加工的情形也颇为多见，翻检原书，自可一一勘察，这里不再说明。

可以发现，经过删订后的八卷本词话，不仅散漫的文字被剔除了，而且内容更为紧凑，理论的周密性得以加强。所以相形之下，八卷本的理论价值更为突出了。当然，从考察陈廷焯词学思想的原生形态或丰富性角度而言，十卷本的价值也不容忽视。

### 三、陈廷焯的词学渊源

一般说来，陈氏早期推崇浙派，创作与论述都受其影响，选本《云韶集》及《词坛丛话》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浙派以朱彝尊为首，成于康、乾间。康熙戊午（1678）年《词综》刻版问世后，浙派所讲究的清灵醇雅，把人们稔熟的目光从唐五代北宋引向清雅而有思致的南宋，给深受明词啾缓习气和淫曼情调熏染的前清词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朱彝尊《词综·发凡》云：

“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陈廷焯沿朱氏《词综》之绪并扩充了明清词而成《云韶集》一编，自称是“以竹垞太史《词综》为准”，在具体词人词作的选录上，他也与朱氏抑扬同道。他的《词坛丛话》在对姜夔、张炎崇尚以及“极工极变”说上，都与朱氏前呼后应。但是，陈廷焯因身世而产生的忧郁气质以及自幼积蓄的入世精神，都使他与浙西词派若即若离，这“若离”部分的渐生渐发，最终使他归诸常州派门下。

陈廷焯以其“沉郁顿挫”词说而在当时词坛自树一帜，推进了常州派理论的发展。但“沉郁”说并非陈氏闭门苦思，一朝所得，它在陈氏早期著述中留有清晰的痕迹。如他评辛弃疾《浪淘沙·山寺夜作》说：“沉郁顿挫中，自觉眉飞色舞。”（《云韶集》卷五）评周邦彦的《兰陵王·柳》说：“又沉郁又劲直，有独往独来之概。”（同上卷四）等等。此外，陈氏还通过对部分词人词作的具体品评，显示出他对“沉郁”词说的朦胧体悟，如评周邦彦的《六丑·蔷薇谢后作》说：“如泣如诉，语极呜咽，而笔力沉雄，如闻孤鸿，如听江声，笔态飞舞，反复低徊，词中之圣也。”（同上）又如评陆游的《双头莲·华发》说：“沉郁顿挫，极淋漓宛转之致，明是哀时伤事，一片血泪，而说来一丝不露，意境虽极悲凉，遣词却极婉约，那得不令人心折。”（同上卷七）合观这两段评语，已经比较接近后来的“沉郁”说，从中可清楚地看到陈氏“沉郁”词说的历史演变。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云：“廷焯受词学于庄械，而接迹于常州二张之派也。”（《集部·词曲类》）陈氏

自己也曾说过：“余词得力处，半有蒿庵一言，半有道农、子薪辩论之功也。”（《词话》卷七）因此，陈氏的词学渊源虽以庄棫及二张为主，而道农与子薪的“辩论之功”也是不容忽略的。

庄棫字中白，江苏丹徒人，有《中白词》一卷。庄氏为常州派后期重要作手，与谭献齐名，并与陈氏同里且有戚谊，年长22岁，陈氏呼为“姨表叔”。陈、庄初遇于光绪二年（1876），这一次相遇是陈氏词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词话》云：“自丙子年（1876）与希祖先生（按，即庄棫）遇后，旧作一概付丙，所存不过己卯（1879）后数十阙，大旨归于忠厚，不敢有背《风》、《骚》之旨。”（卷六）此后双方又有数次见面，而每次相晤，必谈论竟夕，教改旧作，探讨词艺，认识逐渐加深。光绪四年（1878），庄氏对陈说：

“子知清真、白石矣，未知碧山。悟得碧山，而后可以穷极高妙。”（《词话》卷五引）陈氏后来述作《词语》曾回忆及此，言语之间，不胜慨叹。他说：“余初不知其言之恳也。十余年来，潜心于碧山，较曩时所作，境地迥别，识力亦开，乃悟先生之言，嘉惠不浅。”（卷六）他以其词的得力处归于“半有蒿庵一言”，足见他对庄氏的敬重。《词话》对中白词就颇为称赏：“近时词人，庄中白尚矣，蔑以加矣，次则谭仲修。”又说：“余观其词，匪独一代之冠，实能超越三唐两宋，与《风》、《骚》、汉乐府相表里，自有词人以来，罕见其匹。”（卷五）语或稍过，但情意可见。

陈廷焯在领会庄棫的理论之后，遂由“庄”而接迹于张惠言、张琦。张惠言为常州派开山，当浙派末流

竞事绮藻、堕入恶趣之时，张惠言及其弟张琦出《词选》一篇，重整词风。由乐府以上溯《风》、《骚》，阐意内言外之旨，以“深美闳约”的温庭筠、韦庄词为极境。在张惠言看来，大凡词之佳构，“莫不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词而已”（《词选序》）。张氏本此倡寄托、比兴之说，主张从思想内容上尊崇词体，并提出创作和衡鉴词的两项标准：缘情造端和低徊要眇。陈氏心折于此，他说：“诗词所以寄感，非以徇情也，不得旨归，而徒骋才力，复何足重？”（《词话》卷一）这是对“缘情造端”的张论。而他忌词的“一直说去，不留余地，虽极工巧之致，识者终笑其浅”（同上），则是考虑到词体“低徊要眇”的艺术特点的，与张氏同调而精微过之。

伴随着对“二张”的恭奉，陈氏由早期倾向于浙派，转而对朱彝尊、陈维崧、厉鹗大加指责，他首先从根本上否定浙派的词学纲领——汪森的《词综序》，认为是“不知词中源流正变”，只是阿附竹垞之意。在他看来其具体不足有二：一是以姜夔醇雅为宗而归诸“句琢字炼”，这是舍本逐末，所以陈氏讥为“甚浅陋，不知本源之言”；二是认为白石涵盖南宋诸家，陈氏也不以为然，他说：“谓白石拔帜于周、秦之外，与之各有千古则可，谓南宋名家以迄仲举，皆取法于白石，则吾不谓然也。”（《词话》卷十）这一论见确实针砭了浙派为树立宗派而夸大白石的习气。

陈氏词学观的形成，还受到他的同道学友的影响，也就是所谓道农与子薪的“辩论之功”。李慎传字君胄，号子薪，又号承霖，丹徒人。生卒不详。曾任江

宁县训导，国子监学正，有《植庵集》。据陈氏《植庵集序》说：“光绪乙亥（1875）仲夏，始识李君子薪于海陵……往来无间者七阅寒暑。”子薪仕履坎坷，序云：“酒酣耳热，未尝不慷慨悲歌，思有以自奋。”他年逾四十始习倚声。序称他“词则取径玉田，而犹不废猛进奋末之音，则遇为之也”，也颇能知人论世。子薪对庄棫极为尊敬，他曾说：“庄希祖词，穷极高妙，竟难于位置，即置之清真、白石间，尚非其驻足处。”（《词话》卷六引）所以庄棫去世后，子薪亟欲得其全稿以付梓，崇仰之情，可见一斑。子薪对庄棫的崇敬，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陈氏对庄棫理论的接受程度。

子薪词学，没有直接见之于文字的流传，所谓“辩论之功”，也只能是仿佛而已。但道农却有一篇《白雨斋词话·序》在，略可窥见他与陈氏的词学来往。道农即王耕心，河北正定人。官南河侯补同知，工诗古文辞，尤精内典，著有《贾子校正》、《龙苑文稿》等。陈、王初识于同治之季，后并结为姻亲，相知很深。道农论词有所谓“文心文辞”说。所谓“文心”，就是指作者的性情，词的作用与意义就在于抒发性情。他说：“文心之源，亦存乎学者性情之际而已。为文苟不以性情为质，貌虽微，人犹得抉其根，不工者可知。所谓词者，意内而言外，格浅而韵深，其发摅性情之微，尤不可掩。”陈氏《词话》也雅重性情，他说：“情有所感，不能无所寄；意有所郁，不能无所泄。古之为词者，自抒其性情，所以悦己也。”（卷十）其间意脉是相通的。道农还认为，词人好上溯的《风》《骚》，其实只是一种文辞之源，而无关文

心，此即所谓“文辞”说。他说：“故词之为体，诗以为祢，曲以为子，识者为之，莫不沿溯汉魏，游衍屈、宋，以薪上窥《三百篇》之旨，欲谓不如是不足以激其源、涉其奥，其说亦既美矣。然予尝以为此文辞之源，非文心之源也。”此论近似性灵说，和陈氏推源于风骚不同，可见当时辩论之激烈。

总之，陈廷焯的同学渊源是丰厚的，他广泛吸取营养，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中对“二张”与庄棫的汲取尤多，其词学观念的纲纲目目，都大体可从他们那里寻得端绪。当然，这些对陈氏来说，不是一种简单的承袭，机械的组合，而是熔铸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审美趣味，这种熔铸在经过与同道论辩切磋之后，益发趋于稳固。因而陈氏词学思想的扭转，既有时代和环境的召唤，也有他自身审美观念的潜移默化，这是应该引起我们同等的注意的。

#### 四、《白雨斋词话》的理论核心：

##### 沉郁顿挫词说

《白雨斋词话》是陈氏后期重要的词学著作，体现了其词学的最高成就。白雨，古训为大雨、暴雨，亦峰取为斋名，或含深意。《白雨斋词话》自序云：“萧斋岑寂，撰《词话》十卷。”则“白雨斋”意即“萧斋”，亦即岑寂之斋。杜甫《寄柏学士林居诗》有“青山万重静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萝。乱世飘零予到此，古人成败子如何。”“白雨”一词，略含怅惘之情，亦峰斋名，或出于此。在《白雨斋词存》、《白雨斋

诗抄》中曾有三次涉及到雨，一是《摸鱼儿》之“留君少住，愿剪烛西窗，一杯相属，同听夜深雨”，一是《路出靖江怀亡友王竹庵》之“黄芦苦竹秋萧瑟，肠断江楼暮雨天”，一是《过伍子祠》之“斜日西陵路，临江故址存。悲风怨种蠡，苦雨泣兰荪”。无论是“夜深雨”、“暮雨”、“苦雨”，总之，雨给亦峰的感觉是沉重的，愁苦的，他在岑寂的白雨斋中观雨、听雨，引发感慨，营构其词学理论体系。所以以“白雨”名斋名书，其中应寓有深意。《白雨斋词话》的理论核心是沉郁说。自序尝称《词话》曰：“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一是。”可以说，一部《白雨斋词话》就是沉郁说的理论阐述和批评实践的结合。沉（古文作沈），《说文》解作“陵上澍水也”。段注以为湛没之“湛”即其假借，意为“没也”。郁，《说文》释为“木丛者”，段注引毛笺《秦风》“郁彼北林”曰：“郁，积也。”又引郑司农注《考工记》等，说郁即“宛”，段注并曰：“宛与蕴、蕴与郁，声义相通。”可引申为宛曲、宛转之义。陈氏沉郁说含义虽丰，而要义不出于此。《词话》云：“沉则不浮，郁则不薄。”（卷一）则“沉”关乎词的思想的深厚，“郁”关乎艺术韵味的悠长，两者虽有侧重，但其实是彼此依存的。合而论之，则沉郁是陈氏对词的总体的审美规范，它的基本内容有情感与作法两大部分。

陈氏《词话序》曾称，论词而本诸《风》、《骚》是为了“正其情性”，而沉郁的作用之一就是要“见性情之厚”，因此，沉郁正是情性的艺术外观。性关乎天分，又系于学养，“性动为情”，“性”最终是以



“情”的形式出现的。陈氏说：“情有所感，不能无所寄，意有所郁，不能无所泄。古之为词者，自抒其性情，所以悦己也。”（《词话》卷十）陈氏释“沉郁”，其实对情感即已大体规定。他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馥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

（《词话》卷一）这种对愁怨情感的青睐，其实也体现了陈氏对词体的看法。沉郁说首先要求作者性情忠厚，要“思无邪”，所以陈氏上溯《风》《骚》，以屈原忠君爱国、忍辱负重为榜样，将一己之感情受约于政治、伦理、道德之下。因此，陈氏沉郁说的感情有着种种的规范。

陈氏认为情感之沉，无过于悲怨，所以沉郁有时也径称悲郁。词可以怨是词的一种特质。璞函送春词曰：“青子绿阴空自好，年年总被东风误。”陈氏评曰：

“意味极厚，词之可以怨者。”（《词话》卷八）其实，在陈氏看来，词不仅“可以怨”，也应该怨，只是这种怨是由作者性情之怨而行于词意之怨的。陈氏评史位存《谒金门》词就集中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团扇先秋生薄怨，小池风不断’，神似温、韦语。然非其中真有怨情，不能如此沉至，故知沉郁二字，不可强求也。”（《词话》卷四）陈氏论沉郁之情感而强调以怨为核心，这和他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密不可分。中国文学从来就有一条与“怨”并行的创作道路，屈原抑郁下僚而作《离骚》，司马迁穷困委顿愤作《史记》等等，都以创作实践证明了“怨”给文学带来的巨大生命力。陈氏踵论前贤曰：“诗以穷而后工，倚声亦然，故